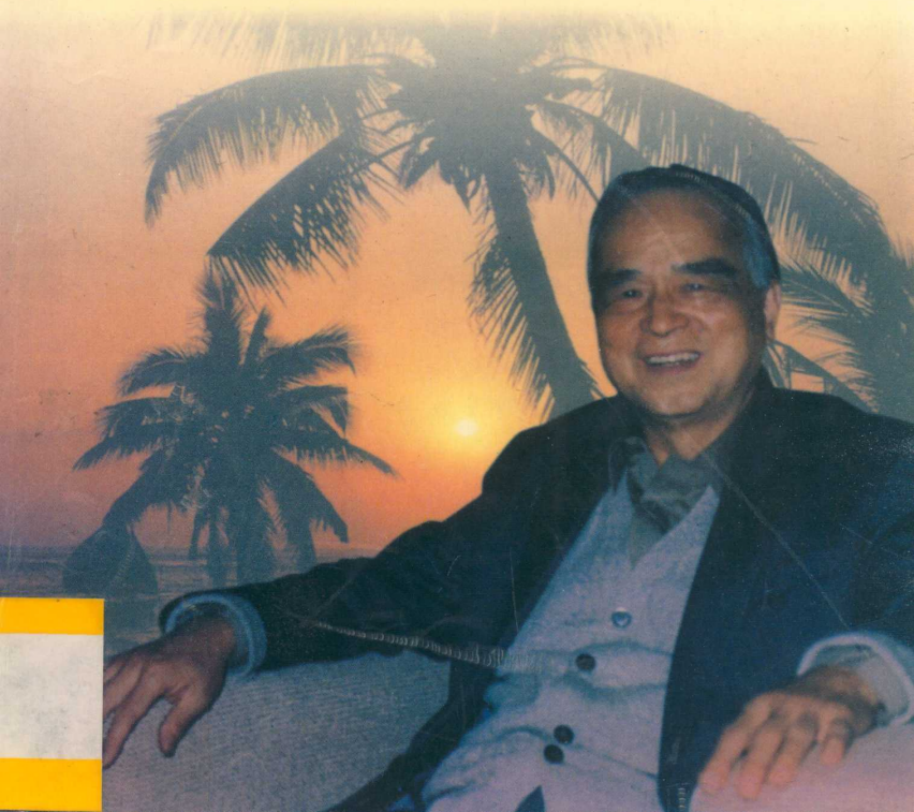


ZHUAN · ZHAN · JIANG · HAI · PING · YUAN

转战江海平原

梁灵光 著



封面题字：卢成瑞



苏通出准(97)第091号(非卖品)

转战江海平原

梁灵光 著

中共南通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

前 言

我的回忆录在南通发行后,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南通工学院的离休干部马骏写信给我,建议将回忆录中我在南通经历的部分单独印行,以便有更多的青少年能够读到她。我把马骏同志的信转交南通市委,立即得到了南通市委的赞同,市委副书记曹能新同志在繁忙的工作中亲自过问了这件事,并作了妥善安排。因此,在不长的时间,这个小册子就和大家见面了。

我于1938年秋初进江海平原,到1948年率部上升华野主力部队离通,整整10个年头,与南通人民一起,度过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大部分岁月,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可以说,南通是我的第二故乡。

我在回忆录的“后记”中曾经写了这么一段话:“从1934年我决定走出书斋,投入革命的洪流起,至今已追随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我个人的历史与党的光辉灿烂的历史相比,不过是奔腾东流的长江、

黄河中一朵小小的浪花”。长江后浪推前浪,继续我们这一代人开创的事业,历史地落到了年轻人的肩上,但五六十年前我们经历的事,对于今天的青少年来说,已经比较遥远,比较陌生。我希望青年朋友们,能够从我个人的一些经历中,了解过去斗争的艰辛,了解一个人的成长和命运,是怎样的和党、和人民群众密不可分,从而,更加坚定地在党的十五大精神指引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我想,印行这本小册子的目的也就在于此。

梁灵光

1997年11月26日

目 录

第一章 回国参加抗战·····	(1)
返回苏北·····	(1)
任视察委员·····	(4)
组织抗战支队 初进江海平原·····	(6)
组建政工队 发展抗日武装·····	(10)
凤凰桥事件·····	(15)
金锁镇风雨·····	(18)
从郭村到黄桥·····	(21)
第二章 开辟苏中四分区抗日民主根据地·····	(25)
筹建如皋县政府 黄桥决战·····	(25)
争取薛承宗·····	(27)
“单刀赴会” 接管南通县·····	(29)
改造保安旅 发展地方武装·····	(35)
发动群众 减租减息·····	(39)
开辟通东、通海、通西地区·····	(43)
反“扫荡”、反“清剿”·····	(46)
欢迎邹韬奋考察抗日根据地·····	(51)
第三章 反日伪“清乡”的斗争·····	(54)
反“清乡”的准备·····	(54)
反日伪“第一期清乡”·····	(60)
奉调四专署 反延期、高度“清乡”·····	(71)
改造基层政权·····	(78)

财经文教战线的斗争	(82)
迎接抗战胜利	(86)
第四章 解放战争中坚持敌后	(93)
备战如皋城	(93)
“白蒲事件”与“南通惨案”	(98)
临危受命 组建华中九分区	(99)
南马塘首战告捷与新七团的组建	(102)
西亭、刘桥战斗受挫	(104)
插回南线 打开通中局面	(107)
灵甸大捷	(109)
第五章 转战通如海启	(112)
群众游击运动蓬勃兴起	(112)
分区主力连战皆捷	(115)
解放区的财经文教工作	(120)
土改复查、“三查三整”和大参军运动	(124)
率部上升华东野战军第十一纵队	(126)

第一章

回国参加抗战

返回苏北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8日，中共中央通电全国，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从此，揭开了全国抗日战争的序幕。

7月下旬，日军向平津发动全面进攻，中国军队顽强抵抗。7月底，北平、天津相继失陷，日军向华北推进。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爆发了八一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集团被迫进行抗战，表示同意西北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随后，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也发表谈话，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我在南洋看到报纸，热血沸腾。

在中华民族危亡关头，我决定回国参加抗战，共赴国难。报经组织上同意后，我就积极作准备。在回国前，我打算先到苏门答腊，会见在棉兰苏东中学任校长的哥哥。郑枢俊（吉隆坡华侨小学校长）与我同往。郑是我哥哥的老朋友，曾当过黎明高中教员。后

来,我哥哥在永泰当县长时郑在县政府当秘书。我们从马来亚的吉隆坡坐火车到槟榔屿,乘船西渡马六甲海峡到达棉兰。

岂料节外生枝,我俩不能入境。按印度尼西亚殖民当局规定,凡进入其口岸的人,必须向殖民政府缴纳人头税 150 荷兰盾(1 盾相当于中国 2—3 块银元),还需要有印度尼西亚居留的人作担保,才能入境。这些规定虽然无理但不难办到。我哥哥来码头接船时,为我们两人作了担保,并代交了人头税款。然而,我和郑枢俊仍不得入境。

原来,郑枢俊曾受我哥哥邀请,在棉兰苏东中学担任过教务主任。后来,因为印尼殖民当局怀疑他有激进思想,靠不住,取消了他的教师资格,并将他驱逐出境。他的情况已被殖民当局记录在案。因此,被移民当局拒绝入境。我与他同行,也受到株连,只好在港口码头上,与哥哥和他带来的十多名学生就地会面。中午,殖民主义者要回去吃午饭,把我和郑关进移民局禁闭室里,达两小时之久。直到下午 3 点钟,才把我们放出来。下午 5 时,我们被移民局人员遣送到原船上,随船回新加坡。殖民主义者对我们华人的侮辱,令我怒火中烧,更激发我对帝国主义者的仇恨,也使我回国投身抗战的心情更加迫切。

1937 年 10 月上旬,我和郑枢俊由马来亚途经新加坡时,走访了东南亚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创办的《南华商报》社。我们受报社委托,接受采写抗日前线动态的任务。报社委派我们为特派战地记者,以便在国内考察采访。我们取道香港,3 天后,换船到上海。

当时,日军已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不久,又攻陷松江,驻上海的中国军队溃不成军,仓惶撤退。只剩下一个团兵力作后卫,驻守在上海的中国、中央、农民、交通四大银行仓库(后被国人誉为“四行孤军”)。团长谢晋元率领所部,顽强抗击日军,日军付出惨重代价,仍不能攻下四行仓库,只好请英国殖民当局出面斡旋调停,诱迫谢晋元部撤进英租界,解除武装。谢晋元后来被日军派人杀害

身亡。

我到马来亚后一直与在上海的李亚群保持联系,我和郑枢俊在一个小旅馆住下后,马上写信通知李亚群。他这时正在上海文化界抗日救国会工作,收到我的信后,立即到旅馆看望我。他问我回国后有什么打算。我对他说,我想到南京、津浦前线看一看后,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李亚群欣慰地望着我,然后,将一份中共中央文件递给我。那时,我还未入党,李亚群将党内文件给我看,说明他对我的信任。文件内容主要是讲关于当前形势和抗战方针的,并号召有志之士投身到敌后去开展游击战争,也谈到不在友党友军中发展共产党员。李对我说:“延安抗大在国内招收大中学生训练三个月,就派到敌后参加工作。你过去在党领导下,工作了几年,已有些经验,不必再到延安去。有条件的话,可直接到敌后开展工作。”

郑枢俊是苏北涟水县人,叫我同他到苏北去。那里地主多,土匪也多。为了保护性命财产,地主豪绅都拥有私人武装。一个县有一万多支民枪,有利于开展游击活动。在上海住了一个星期后,我和郑从上海坐船到南通,再坐小船经海安、泰州到镇江。朱含章的家住在镇江。我远渡马来亚期间,一直与她保持书信往来。这时,朱在上海暨南大学毕业后呆在镇江家中,我顺路去探望她。

离开镇江,我又和郑枢俊到南京,找我哥哥一位同窗好友彭镇寰。彭是国民党元老邵力子的秘书。此时,日军已逼近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决定撤往武汉。彭劝我随他一起西撤,在国民党政府中工作;也可介绍我回福建。我对彭说:“我在南洋教书,本来就有一份既安定,收入又不错的职业,要图安逸,不如留在南洋。我不远万里从南洋回国,是想参加抗战的。”我谢绝了彭的好意。第三天,彭随国民政府撤走。我和郑枢俊便告别了将要沦陷的南京。时值日军兵临苏皖,逃难者遍野,水路交通紧张。几经周折,经扬州、淮阴,回到郑枢俊的家乡涟水。

当时,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路线。我和郑枢俊通过当地军、政界关系,多方努力,伺机组织抗日武装,却成效不大。郑已气馁。涟水县长请我们吃了一顿饭。郑留下来,在县政府当第三科科长,管群众动员和民政工作。

快过农历年了,这时,朱含章一家已从镇江搬到宝应县。正好我没有事做,便去探望她。朱含章的父亲朱花农是个慈祥的长者,曾任过国民党江苏省政府科员,他对我客客气气。我在朱家过年,住了一个月。我和朱含章的关系也在这时定了下来。

任 视 察 委 员

1938年春节刚过,郑枢俊就挂来电话,要我赶往淮阴,那里是专员公署所在地。

江苏省主席原是陈果夫担任。蒋介石对人事调整后,派顾祝同兼江苏省主席。顾未到职。江苏省政府实际上由代主席韩德勤坐镇,韩是国民党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江苏省政府和总司令部均设在淮阴,淮阴成了江苏省的政治中心。韩带两个心腹,一是秘书处长鲍淑明,一是行政处长刘旦晖。郑与鲍是好友。郑抓住这个关系,想通过鲍的特殊地位作用,去实现开展抗战工作的愿望。

我赶到淮阴,与郑枢俊会合后,一起去见鲍淑明。鲍爽快地对我和郑说:“你们到省政府当秘书,怎么样?”我和郑直言相告:“我们回国是要抗日,不想当官,天天坐在机关里办公文。”一时双方未达成共识。

这时,苏北很快成为敌后,韩德勤也想到要动员群众,于是组织了江苏省战时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下分几个部。鲍淑明再见到我和郑时说:“既然你们要为抗日干些具体事,就到动委会去当视察委员吧!”这个职务是负责检查监督各地组织群众、动员

群众,进行抗战活动的。没有工资,一个月只发车马费 24 元,好在我 and 郑回国时都各带了几百元,生活暂时不成问题。鲍见我们没有异议,便向兼任动委会主任的韩德勤写报告。韩看后,颇为疑惑地问鲍:“他们两人在南洋教书安安稳稳,怎么跑回来干这个冒险的差事?”鲍对韩说:“可能他们两人在南洋活得不耐烦了吧!”韩听后哈哈一笑,用手搔搔后脑,拿笔在报告上批了“同意”两字。鲍出来跟我们说起此事,我们不禁哑然失笑。

我担任了“动委会”视察委员,又应国民党江苏省抗日青年团(简称抗青团)教育长张翼的邀请,兼任抗青团政治教官,主讲国际政治课程。抗青团是韩德勤创建的青年训练机构。张翼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在中共领导的工农红军当过师参谋长,后来变节投靠国民党,被当时在贵州屯驻的韩德勤收入麾下。与我在抗青团共事的另一名教官邝朱权,讲授游击战术课。邝原在共产党内资格较老,当过湖南省郴州市委书记,参加过湖南暴动,当过红军湘赣军区负责人,原是陈毅部下,后来变节投靠韩德勤。韩从贵州走马江苏省上任,之所以将这两个人带在身边,是想利用他们在江苏敌后打游击。

我到淮阴时,认识了郑枢俊的朋友吴卫久,他原是江苏省政府视察,和韩德勤是同乡,都参加了复兴社,当韩接管 CC 派的特工指挥处时,就派吴卫久去当主任。指挥处下边的骨干几乎全部是由共产党叛变的人员组成的。吴手下有个秘书叫董国桢,还有姓郑和姓皮的两个股长。

我在任职期间,接触到不少国民党内较高层人士,耳闻目睹之下,更觉得他们腐败堕落。韩德勤的二十四集团军只有一个主力部队即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他们消极抗战,当时民间流行一首民谣:“国军八十九,怪事样样有,敌去它收复,敌来它就走。”韩与李都是苏北泗阳一带的人,任人唯亲,所以流传:“能说泗阳话,便把皮带挂(指当军官)。”不少当权的官员,口讲抗日,却终日沉迷于

酒色赌局之中，歌舞升平。吴卫久指挥处的秘书、股长和省府一些官员，晚上几乎都到妓女家打麻将玩妓女，其他也可想而知了。我对他们完全失望，便想离开淮阴到延安去。正要走，这时徐州会战结束，交通中断，没有走成。

组织抗战支队 初进江海平原

1938年5月，著名的台儿庄战役结束，前后共歼日军一万余人，这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正面战场取得的最重大的胜利。日军迅速调整进攻徐州的作战计划，集结兵力，加强对徐州的合围。5月19日，徐州失守，苏北成为敌后。地方上动荡不安，国民党对下面的控制相对削弱，若能因势利导，这确是发展抗日地方武装的有利时机。

6月，吴卫久和郑枢俊抓住这个机会，分别利用泗阳、涟水当地人事关系，收编了一些农民和零星武装，各组建一个大队（营）的队伍，省政府给予“江苏省民众抗日自卫队独立第一支队”（简称抗战支队或抗支）的番号。抗支下设两个大队，支队长吴卫久，副支队长由郑枢俊和邝朱权担任。邝对韩德勤不满，说他“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是个荆州刘表”，不久离开抗支。我任支队政治处主任。其时，国民党部队团一级仅设政训室，营、连设政训员。我看到了上海刊物介绍新四军采取“团结”支队代号的情况，于是向吴、郑建议支队设政治处，大、中队设政治指导员，我们的部队也采用“抗战”支队的代号，他们都同意而照办了。抗支直属韩德勤的省政府管辖。因为经费困难，全支队不论官兵每人每月只发5元的薪饷（包括伙食在内）。6月间，部队开到洪泽湖畔的蒋坝整训，进行政治、军事、文化教育。这时，日军轰炸淮阴，省政府也搬到蒋坝。董国桢调到政治处当秘书。

同年秋，吴卫久被任命为如皋县县长，旋即率领抗战支队南进

如皋。如皋县城早在这年3月19日被日军占领,县政府迁到东乡的马塘镇。9月19日,抗战支队进驻马塘镇。

如皋县隶属于江苏省第四行政区(简称苏四区)。该区地处江海平原,包括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崇明等五个县,但崇明是个孤岛,且已被日军占领,行政区事实上管辖不到。苏四区东濒黄海,南临长江,土地肥沃,人口稠密,与大都会上海仅一江之隔。古城南通,兼有水陆交通之便,是苏北农副产品集散地和经济文化中心。

这里还是一块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区。早在大革命时期,南通就有了共产党的组织。1928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如皋、泰兴的农民举行了大规模的暴动。1930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在这里诞生。红十四军的武装斗争遍及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和靖江、泰兴等广大地区,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地主势力。

当时苏北的形势是,一方面,日本侵略军陆续侵占了重要城镇,并控制了主要交通线,但限于兵力,对广大农村尚鞭长莫及;另一方面,国民党地方政府及其武装力量,大敌当前,却毫无战备和应变措施,纷纷向农村中小市镇地区撤退。一些国民党官员和地方实力派人物,则打着抗日旗号,收集散兵游勇,组织各种武装。他们各霸一方,勾心斗角,设卡收税,抗战消极,扰民有余。真是“流氓无赖青红帮,啸聚人马霸一方;自封司令遍地是,有枪就是草头王”。当时在这一带活动的国民党地方武装和杂牌部队主要有:彭龙骧的通崇海启抗敌指挥部(后编为南通保安旅)、何克谦的常备团(后编为保安第四旅)、薛承宗的常备二团(后编为保安第一旅)、张翼的保安第三团(后编为保安第三旅)、孙信符部队(后扩编为保安第五旅)、丁聚堂的常备七团、颜秀五的常备八团(后被李明扬收编为鲁苏皖边区游击第五、第六纵队)、丁维藩的江苏省第四区保安司令部特务总队(简称特务总队)、通海实业警卫团、以及张

能忍、陈才福、陆洲舫等部，总计约 3 万人。这些队伍本身派系林立，弱肉强食，很不稳定，经常改变番号和隶属关系。广大人民群众饱受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军的蹂躏，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的自发斗争此起彼伏。

抗战支队到马塘后，吴卫久忙于县政府的事情，很少过问抗支的事，副支队长郑枢俊经常借机往上海跑。所以，一段时期抗战支队的事实是我负责的。吴卫久还给了我一个如皋县战时动员委员会组织部长的头衔，主持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吴卫久还任命当地知名人士叶胥朝当马塘区区长。叶胥朝是 1927 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但他的公开身份一直是国民党左派。大革命时期，他是如皋县党部的成员，一直在县城和东乡一带从事革命活动。叶胥朝出身于一个富有的家庭，在当地有广泛的社会关系。大革命失败后，他被国民党长期关在大牢里，直至抗战爆发后才得以获释。吴卫久任命叶胥朝当区长，是想利用叶的地位和影响，来拉拢地方的实力派。叶只有 30 多岁，但阅历丰富，特别是铁窗生活的磨练，使他显得更加成熟。他满头白发，在大家的心目中是一位忠厚长者。抗战支队到马塘后，由于工作关系，我和叶过从甚密，很快由相识到相知。他处事公允，宽厚待人，工作中也给了我们不少的支持和帮助。

吴卫久是一位政客，热衷于做官，这在抗战支队成立之初我就有所察觉。但在举国一致的抗战形势下，吴卫久也知道，不打抗战的旗号，他的官也是保不住的。我的想法是，尽量争取他抗日，至少不要使他反对我们抗日。因此，我利用各种机会，做他的思想工作，曾经将斯诺写的《西行漫记》等介绍给他读。他看后对我说“我只谈抗日，不管哪个党派”，以示他的“不偏不倚”。有一段时间，他对我在部队和地方上的活动，也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

当时，在距马塘 9 公里的地方，驻扎着特务总队的总队部。我经过调查了解，知道总队长丁维藩及大部分领导骨干，都是国民党

中统分子,但特务总队里有一批抗日救亡的青年积极分子,宣传活动搞得很活跃。我想,要在如皋开展抗日活动,这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于是,我就以抗战支队代表的身份去特务总队访问。接待我的是总队参谋长李俊民和政训处副主任顾民元。初次见面,李、顾两人就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李俊民温文尔雅,谈吐不俗;顾民元年青英俊,风度翩翩。他们告诉我,特务总队在通如海启地区的众多杂牌部队中,还算是比较开明的,总队长丁维藩和政训处主任潘遂初,都声称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向李、顾提出,既然都是抗日的部队,今后两支部队要加强联系,遇到情况,要相互支持和配合,他们都爽快地答应了。

后来,我才知道,在特务总队中,除李、顾两人外,还有马一行、史白、袁明、姚溱、吴天石、赵琅、理明等一批地方抗日进步青年,他们都是地方知识青年中的佼佼者,大部分出身于书香门第,受到过良好的教育,有的人早在30年代初就积极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另外,不久前,从上海过来的陈伟达、吴佐成、洪泽、郭守信、廖绪忠、罗伦、何心如、姜辛耘、孙燮文等,也在部队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李俊民、顾民元两人,都是失掉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李俊民的小说《跋涉的人们》曾得到鲁迅先生的赞扬;顾民元曾与江上青等在上海合编过一本颇有影响的刊物《阅读与写作》,也是一位颇有才气和成就的作家。抗战爆发后,他们一方面积极寻找党组织,另一方面,通过各种关系,在国民党部队和地方上组织进步青年,开展抗日斗争。

1938年10月下旬,因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倾轧,特务总队队长丁维藩在泰州被韩德勤借机扣留,韩的亲信江苏省第四区游击指挥张翼通知抗战支队,要求配合他缴特务总队的械。得到消息后,我感到事态紧急,便对吴卫久说,特务总队也是抗日的队伍,我们不能内部互相残杀,应采取和平的方式联合起来抗日,吴卫久同意我的意见。于是在部队即将行动的当天傍晚,我约李俊民、顾

民元到曹家埠附近的六总桥会晤，将实情告诉他们，并建议尽快将驻曹家埠的特务总队总队部及二支队带到掘港与抗战支队会合，李、顾也认为只有这条路行得通。我说：“事不宜迟，你们赶快回去行动吧！”可是，当他们回到曹家埠时，总队部人员及二支队第四大队（姜彬部）因事先闻到风声，已全部跑散，只带了一个教导队到抗战支队来；另派人通知驻华丰公司的第五大队（黄刚部），将部队带到掘港，不料该部第二天拂晓在去掘港途中，与张翼部的张星炳保安三团遭遇被包围，黄刚派人到掘港向我们告急，当我带抗支部队赶到银杏埠时，五大队已于 20 分钟前被缴械了。驻九门闸的二支队六大队（李苍萍部）闻讯也跑散了。这样，特务总队也就不复存在了。

组建政工队 发展抗日武装

1937 年 10 月，国共两党谈判达成协议，将南方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为副军长。1938 年 1 月，新四军军部由汉口迁至南昌后，随即指挥下辖的四个支队进入长江南北的敌后区域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共产党的组织在敌后也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

1938 年 8 月，在抗战支队到达马塘前，中共江苏省委就派唐守愚（唐绍宗）、陈伟达、吴佐成 3 人组成中共江北特区委员会，由唐守愚任书记，到苏北通如海启一带开辟工作，并从上海带来了一批共产党员和抗日进步青年。他们通过顾民元、马一行等人的关系，进入特务总队开展工作。但是，顾民元等人并不清楚他们的真实身份，只是从直觉上感到他们是积极抗日的，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我虽然 1934 年在上海参加学生运动时就与党团组织有了联系，但回国后仅在上海跟李亚群有过接触，江北特委对我的情况并不了解。特委出于革命警惕，对吴卫久是有戒心的。我在抗